

【国际政治前沿译丛】

丛书主编：俞可平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

【英】詹姆斯·梅奥耳 (James Mayall) / 著  
王光忠 / 译 石贤泽 /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国际政治前沿译丛】

丛书主编：俞可平

# 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

【英】詹姆斯·梅奥尔 (James Mayall) / 著  
王光忠 / 译 石贤泽 /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5-5046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James Mayall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英)梅奥尔著;王光忠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3

(国际政治前沿译丛)

ISBN 978-7-80211-854-6

I. 民… II. ①梅… ②王… III. ①民族主义-研究 ②国际关系-研究

IV. D091.5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4349 号

### 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

---

出版人 和 龔

丛书执行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朱 虹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11.75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 编者说明

改革开放过程，也是中国加入国际社会，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过程。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 30 年经验的时候，把中国参与全球化作为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之一。他说：“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要为促进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编选这套“国际政治前沿译丛”的初衷就是，希望能为日益国际化、全球化的中国提供更加多样的国际政治知识的支持和参考。这个想法产生于 2004 年初夏俞可平教授与一位在剑桥大学留学的中国学者的谈话。双方谈到了国内对于国外的国际政治著作的引介工作，都认为不应该只把目光集中在个别国家，特别是美国，应该注意到其他国家中关于国际政治的著作，这样才能了解到更多的观点、思想，才能有所比较，并且汲取百家之长。这位中国学者回到剑桥后，就联系了一些英国学者为我们推荐了一批他们认为富有价值的著作。当然，其中多部是“英国学派”的代表性著作。我们又根据当时国内已经翻译的国际政治著作的情况，从这些著作中挑选出一些。现在，这些著作

将陆续与读者见面。

尽管这些著作的论题不同，但有三个共同特点：首先，这些著作都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有学者认为，英国学派最大的理论特色是他们主张用历史、法律、哲学的方法来“阐释”国际政治，而不是用需求对国际政治进行“解释”。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国际政治不仅仅是实力政治，也是价值政治。其次，这些著作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构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以及世界社会。围绕这些核心问题，不同学者分别从逻辑推演、历史分析角度进行了论证。这些都是大问题，需要大视野、大答案。这对于我们思考目前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最后，这些著作在国外学术界乃至教学中，都具有良好的声誉。有的书已经再版多次，并且成为所在领域的权威性著作。借助这些书，我们可以更及时地了解到国外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

译译是一件痛苦而充满期待的工作。本套书从组织翻译到校议统稿，历经四年之久。译者有的已经离开北京到外地工作，有的到海外留学深造。翻译过程中也经历了多次反复，一些译者用很多时间与作者就具体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丛书编辑为了统稿校对花费了大量精力。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努力终于换来了沁人的书香。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政治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则是现在的历史”。我们希望这些著作能为我们理解当前的国际政治提供历史和理论的借鉴，也希望我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也能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 致 谢

在这里我想表达对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所和国际研究中心秘书处全体职员的感激，特别要感谢帕姆·豪杰斯（Pam Hodges）和马格利特·波斯维尔（Margaret Bothwell），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将无法出版。我还要感谢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 New Hampshire）政府研究所，以及新德里贾沃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New Delhi）政治研究中心，他们为我在1984—1988年间写作本书提供了有利条件。本书第四章的较早版本曾经发表在《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1985年第11卷第2期。非常感谢该杂志的编辑能够允许我在书中使用其中的部分内容。

在知识方面，我从朋友和同事中所得甚多。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好几年里，我曾经和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泊西·科恩（Percy Cohen）以及乔治·斯考普夫林（George Schopflin）等一起开设过一个有关民族主义的研讨班，很感谢他们几位一直以来对我在此主题上的兴趣的鼓励，还要感谢所有参与研讨的人士，他们贡献的知识有助于我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哈里·拜伦（Harry Beran）、约翰·查维特（John Charvet）、迈克尔·丹兰（Michael Donelan）、迈尔夫恩·

福劳斯特 (Mervyn Frost)、罗伯特·杰克逊 (Robert Jackson)、彼得·莱恩 (Peter Lyon)、约翰 (John) 和文森特 (Vincent) 等阅读了本书的最后打印稿,并提出了宝贵的评论和建议。在过去的好多年中,就本书的不同主题,我在与很多朋友的讨论中获益匪浅,他们是:丹尼斯·奥斯丁 (Dennis Austin)、大卫·巴尔德温 (David Baldwin)、埃巴·道尔曼 (Ebba Dohlman)、罗杰·霍姆斯 (Roger Holmes)、莫里斯·金斯-索普 (Maurice Keens-Soper)、马告特·赖特 (Margot Light)、伊恩·卢斯迪克 (Ian Lustick)、伯里·马约尔 (Berry Mayall)、科奈丽娅·纳维里 (Cornelia Navari)、阿斯威尼·雷 (Aswini Ray)、高塔姆·森 (Gautam Sen)、菲利普·文德萨 (Philip Windsor) 以及其他一些人。最后,我要感谢的是艾乌丽尔 (Avril),她不仅分担了我的许多焦虑痛苦,还是我最富开创性的益友。自然,本书观点的任何错误和不当之处都由我负责。

# | 目 录 |

|                 |      |
|-----------------|------|
| 致 谢             | / 1  |
| 导 论             | / 1  |
| 第一章 国际体系研究：理论问题 | / 5  |
| 争论中的“体系”        | / 9  |
| 秩序之源            | / 12 |
| 退回到描述           | / 18 |
| 第二章 国家间社会       | / 21 |
| 传统模式            | / 21 |
| 民族主义之影响         | / 30 |
| 第三章 民族主义与国家的产生  | / 42 |
| 原则              | / 43 |
| 新的政治版图          | / 50 |



|                              |           |
|------------------------------|-----------|
| <b>第四章 民族主义与国际秩序</b>         | / 60      |
| 民族自决的驯化                      | / 60      |
| 从国联到联合国                      | / 65      |
| 两个挑战                         | / 68      |
| 民族成功的前提条件                    | / 76      |
| <br><b>第五章 经济民族主义与自由世界秩序</b> | <br>/ 83  |
| 欧洲国际体系的经济框架                  | / 86      |
| 自由主义的国际社会                    | / 92      |
| <br><b>第六章 新经济民族主义</b>       | <br>/ 105 |
| 战后体系                         | / 106     |
| 新工业保护主义                      | / 125     |
| 农业保护                         | / 126     |
| <br><b>第七章 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b>    | <br>/ 131 |
| 政治和知识背景                      | / 133     |
| 民族主义与去殖民化                    | / 137     |
| 法理国家与“虚构”民族                  | / 145     |
| <br><b>第八章 第三世界与国际社会</b>     | <br>/ 149 |
| 修正主义联盟                       | / 150     |
| 改革计划的逻辑与结构                   | / 158     |
| 评价                           | / 165     |
| <br><b>结 论</b>               | <br>/ 172 |

## 导 论

本书旨在探讨在民族观念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的含义，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国际社会指的是什么？国际社会这个观念建立在何种规范原则之上？民族主义理念（以及更广义上的民族观念）是如何影响国际社会的演进的？和最近很多研究民族主义的作品（它们试图将民族主义的产生归结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不一样，本书的关注点在于民族主义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后果，即讨论一种观念对另一种观念发展命运的影响。

民族主义和国际社会这两种观念之间的遭遇塑造了 20 世纪，其中，许多读者可能对民族主义更为熟悉。然而，这两个术语的意思是有争议的，所以，确定我在本书中在何种意思上使用它们是有帮助的。

常常有人甚至否认国际社会（存在）的可能性，他们将国际关系中冲突的普遍存在视为国际关系并不受制于最小限度的团结（它对确保社会凝聚力必不可少）的佐证。还有人否认国际社会（存在）的可能性，他们强调国家确立了政治组织和社会道德各自的界线。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关系中的任何秩序都只是各种竞争性国家谨慎计算的结果。国家的行为既不受制于那些带有普遍诉求的道德考量，也并没有

标明一套共认价值。充其量，只能把国家之间的常规互动称作一种国际体系。<sup>①</sup>

那些使用国际社会这个概念的人则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政治的全球体系衍生于17世纪至20世纪间的欧洲国家间体系。尽管彼此之间存在敌对和战争，欧洲的君主们都认同了对其自身行为的道德约束和共享的特定价值。倘若没有这些（道德约束和共享价值），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外交体系都不可能形成。而且，在国家之间的关系当中不断地诉求于社会的理想，正如他们的后继者运用国际共同体这一观念一样。这一事实强有力地表明，“整体大于局部”的社会观实际上影响了政府的行为。<sup>②</sup>

国际社会是国家间的社会，而非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从这一论断所需条件（比如必须考虑到对人权或跨国经济合作的普遍认同）的范围来看，它（国际社会）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主义理念影响下人民主权取代王朝主权或传统主权的成果。

与国际社会相比，民族主义甚至是一个更具争议的概念。基本问题缘于民族这一概念的分析明晰度远不及于它的政治实用性。困难就在于如何界定民族这一概念本身。它只是一种现象，抑或多种现象？

大量的研究都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并试图在（民族的）各种类型和次类型之间作出区分。<sup>③</sup> 其间，语言的、种族的和政治的标准都一一分别地或者通过各种联合的形式被加以运用。在世界的一些地方，民族主义是伴随自由宪政和民主政府而出现的；而在其他地方，它却是帝国征服带来的一种反应。19世纪，欧洲对民族自决的各种诉求是

---

①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77), pp. 9-13.

② 参见 Peter Wilson,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reply to Sheila Gra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5, no. 1, January 1989, pp. 49-58.

③ 参见 Hugh Seton-Watson, *Nations and States: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N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London, Methuen, 1977)。也见第一章第6页注释2。

以所谓的先存的文化共同体的名义提出来的。20 世纪, 亚非的民族主义运动常常是为了与殖民主义抗争而形成的政治联合。只有在获得独立后, 那些反殖民的领导人才面临在他们承继下来的国土上建立民族的任务。最后, 也有一些地区的民族特性已经存延了几个世纪, 尽管它们缺乏一种政治组织, 并且散布于很多不同的国家之中。

在本书中, 我有意地不给民族或民族主义强加一个单一的定义。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的本质特征无足轻重, 相反, 原因在于我的关注点是民族和国际社会两种观念之间的互动。从社会学或者历史学的角度来看, 显然存在多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 但是民族这一观念本身并不模糊。它强调世界是 (或者应该) 划分为不同的民族的, 而民族是主权国家唯一的合理基础, 也是政府权威的终极来源。我论及了一些独特的差别, 比如工业化的西方世界中那些主体中央集权式的民族—国家与第三世界中的国家—民族之间的差别, 那是因为民族观念的这些各自不同的特性表现已经对国际社会的演化和组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书的论述分为五个部分。前两章关注于一些理论问题。基于本书主要目的, 首先着手于国际背景, 而非 (像大多数研究民族主义的书那样) 着眼于民族本身。由于国际社会观念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国家行为的道德 (或至少是规范) 约束的可能性, 本书开始即以有关奠定国际关系的一些理论说明问题的简短讨论而展开。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理论对象 (国际社会) 的身份地位问题。然而, 作为一个历史概念, 其身份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且, 正是这一历史概念遭受到了民族主义的挑战和改造 (起初是在欧洲, 随后是在世界范围内)。本书剩余部分的论述思路就是围绕民族主义和国际社会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相互挑战和调适过程而展开的。第三、四章, 描述了民族主义是如何 (在民族自决和反殖民主义信条的幌子下) 催生国家并推动国际社会边界的水平扩展 (以至于如今达到了遍及全球

的程度) 的。

在过去的时期里, 世界的经济整合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紧随这个时期, 许多新兴的国家诞生了, 随之带来的是国际社会的扩展。这部分是自 15 世纪以来连续几波欧洲帝国扩张的结果, 部分是 19、20 世纪中主要工业力量之间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的结果。伴随着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的出现, 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它自称解释了这一过程。这一意识形态反过来又激起了民族主义的回应。**第五、六章**考察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看法上的对抗, 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国家的活动向下延伸到普通民众的生活, 向外延伸到国际经济的管理。

1919 年之后, 国际社会这一观念通过国际联盟这一多边主义外交框架, 以一种制度形式得以实现。1945 年以后, 除了联合国 (国际联盟的后继组织) 之外, 这一理念又通过一种经济合作的制度框架的建立而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很多后殖民国家的民族主义正是因应这一战后国际经济秩序而发展起来的。**第七、八章**, 讨论了经济发展之所以成为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中如此重要的因素的原因所在, 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作的试图改变国际社会经济秩序的努力 (这种努力总体上并不成功)。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概括本书的基本论证并且反思它对未来的启示。

## 第一章 国际体系研究：理论问题

没有人否认，民族主义对 20 世纪的国际政治影响巨大。然而，一个更具争议性的问题是，这一影响究竟可被视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抑或仅仅是一个中性的事实（一个在明晰的政治分析得以展开之前必须正视的论据）。这三种主张都有自己忠实的拥趸，它们虽各执一词，但是都认同一点，即民族情感对理解现代世界具有普遍而重要的意义。

对那些有意建构民族主义宏观理论的人来说，令其倍感遗憾的是缺乏一种关于民族主义的具有国际影响的权威论述。<sup>①</sup>一方面，没有这样一种论述，民族主义自身将继续回绝终极性的阐释，因为基于同样的原因，民族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源于或囿于某一特定的国际环境也并不明确。另一方面，在国际政治分析中，民族主义很容易被当成一只信手拈来的黑箱，任何在其他分析框架中无法解释的东西（这种情况在相关作品中比比皆是）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被放入其中。不过，

---

<sup>①</sup> F. H. Hinsley, *Nation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3) 是为弥合这一差距的一个认真的尝试。

无论遗憾与否，这种权威论述的缺失并不会轻易被忽视。其原因可以通过比较民族主义对单个个体国家政治及其对总体国际体系的不同影响分析得知。在第一种情形中，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关于民族主义思潮以及民族主义运动如何攻击并征服那些所谓的合法性教条和各种相关制度（它们为欧洲古典政制<sup>①</sup>以及隶属欧洲帝国的亚非政权提供了制度支持）的途径的基本合理的解释。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正是在这点上做了很多工作。<sup>②</sup>至于第二种情形，我们讨论的对象尚不十分明确。

也许，乍看上去这一论断显得十分荒唐刺眼。毕竟，那些研究过民族主义起源和传播的人，无论对其（民族主义）肇因或者它给现代国家带来的后果，都很少达成共识。当然，国家这个概念本身也存在广泛的争议。关于政府应该垄断合法暴力，政府必须拥有必要征税的能力以维持其正常运行，或者某一国家的独立存在应该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等，是（国家成立与否的）充分条件呢，还是必要条件？我们应该接受上述问题所暗含的那些绝对标准，并且采纳一种纯粹描述性的国家概念吗？倘若真是如此，我们也将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世界上存在着 159 个国家，因为不可否认的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就是 159 个。

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接受（甚至，我们是否已经私下里相信，无论我们如何公开矢口否认）这样的看法：在最终的分析中，仅仅只有

---

① 尤指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及政治制度。——译者注

② 在这三大原则范围内的民族主义作品范围很广。A. D. Smith,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London Duckworth, 1971) 为此类相关社会学的作品提供了一个导论。Alfred Cobban,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至今仍然是关于民族主义思想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的最好的历史学方面的著作。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83) 以及 John Breuill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2) 是最近以来新加入这类作品的最有趣的著作。

一些国家值得认真考虑。在这一点上，就像神话故事里存在辨别一个真假公主的潜在标准一样，在政治世界中我们必须承认一些国家的客观存在，而对其他“国家”的认可要么是临时的，要么仅仅是一个形式。在第一种情形里，区分的标准与公主的皮肤对一颗豌豆的触压的敏感性有关；在另一情形中，区分的标准源于某一特定个人对其在人类集体命运中的角色的自觉理解。神话故事里的那些标准与政治理论中的那些是有所不同的，但个中原则是一样的：存在一个表象世界，但是有一种“本质”的东西隐藏在形式的和表面的秩序之下。

这一论争看上去可能有些不足挂齿，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它关涉到现代思想中的两大主流观点。其中一种观点主张，在这个情形中（如同其他所有情形一样），倘若我们要想将已知世界、可知世界与幻知世界、想象世界区分开来的话，必须存有一套最朴素的与背景无关的衡量标准和评估标准。另一种观点则（同样强有力甚至更具洞察力地）认为，无论我们对自然世界有何认识，在我们理解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属于文化世界）时，任何值得去认识的事物都充满着特定的内涵和意义。与背景无关的知识是不存在的：我们要么据其特定的意义来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要么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怎样与过去，更重要的是与未来发生关系。实证主义的科学史观是荒谬的，这种科学史观认为世界是由独立于人类意愿的规律来支配的。在民族主义对单个国家和国际政治二者的影响之间并不存在重大差别：唯一有趣的讨论在于这一差别关注于“真实的”历史性的民族国家在国内和国际的有意识的发展。

然而，尽管这一发生在实证主义者与历史相对论者之间的论争对我们理解现代世界至关重要，但它也未能免俗于那种无法提出明确解决之道的论争之列。而且，历史相对论者也承认，正如存在一个“真实”国家的历史世界一样，也存在一个国家的现实世界。这一事实建



构起了民族主义得以展开分析的关联背景。再者，在一个看上去似乎变迁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增长的世界，这一相对稳固的基石是令人鼓舞的。在这个平台里，我们完全可以对实证主义者与历史相对论者之间的这个问题不置可否。对当前的目的而言，接受这个国家体系的正式秩序就足矣。

需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所有这些正式的国家（它们的政府参与各种正式的国际交往、享受着彼此承认的尊严和联合国的成员资格）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在地图上有各自的区位；它们有相对明确的疆界；它们有固定的人口和确定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可否认，由于民族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在世界不同地方之间往来旅行是一项越来越危险的活动（当然，倘若非得必要，并且决心足够，这也未尝不可）。再者，因为各个国家通过这种途径是可以进入的，理论上（如果事实并非总是如此的话），它们的政治体系面对外来考察是开放的。

相比之下，国际体系却并无上述（国家所具有的）任何要素。它没有具体的实体存在，原则上它的疆界都无法划分（究竟有何物可以立足于国际政治体系的疆界之上呢？），当然无人可以前往那里。任何曾经试图探讨国际关系的总体背景的人，最终都被迫使用一些集体名词。有些人使用“人类共同体”的概念，也有人用“国家间社会”，还有人用“国家间体系”或者“世界社会”，以及一系列的“国际机制”。无论借用什么样的集体名词，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给人类活动的某个领域强加一定程度的秩序约束，在那里是无可避免的、极其糟糕地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更多地是由偶然性来主宰的，而非由系统的规则约束的行为来主宰。也许这个为人熟知的论争也是如此。但是“假定”一词是操作性的。既然“国际体系”一词甚至在形式意义上都缺乏任何经验性内容，它常常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具争议的概念也就不足为奇。

正是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是存在于更为广大的世界之中的，针对民